

外国影片研究丛书

朱莉亚

中国电影出版社

外国影片研究丛书

朱 莉 亚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 9 8 0 北 京

Lillian Hellman

Pentimento

Signet Book, 1974

电影剧本据影片整理而成

内 容 说 明

本书为“外国影片研究丛书”之五，收录了美国影片《朱莉亚》的剧本，以及据以改编的原著——美国剧作家莉莲·海尔曼的回忆录《原画再现》的片断。

《朱莉亚》是把真人真事再现于银幕的一部影片，片中细致地描绘了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美国杰出的反法西斯战士朱莉亚的战斗历程。她把百万之富的继承权视同粪土，冒死犯难，投身于营救遭受法西斯匪帮残酷迫害的共产主义者和坚持反法西斯斗争的人，终遭盖世太保捕获，备受残酷折磨之后壮烈牺牲。影片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为反法西斯斗争献出一切的进步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也描写了她的生死之交的知友莉莲对她无比的热爱，对她的正义行动则不畏艰险地给以大力支持。影片也以较多的篇幅描写了她们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生活，以及她们之间的革命友谊。

朱 莉 亚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4 插页：4 字数：95,000

1980年6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8,500册

统一书号：8061·1408

定价：0.57元

编辑例言

我们现在出版的这套“外国影片研究丛书”，作为一种新的尝试，终于同读者见面了。

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书的目的，是向从事电影创作的同志们以及有志于写作电影剧本的一般读者，提供一批有参考价值的改编电影剧本，同时提供据以改编的原作或有关素材。通过这种编辑方式，读者可以对照阅读原作和改编剧本，这就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对两者进行分析研究的机会，从中看出原作和剧本在表现主题、安排情节、刻画人物和处理场景等方面的相同与不同之处；看出两种艺术手段，其中特别是电影手段的长处与局限。我们认为，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和比较，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要比阅读一些有关改编问题的抽象理论更易于得益。

就我们所知，改编向来是电影创作的一种主要方式。自从电影发明以来，世界各国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剧本是为数极大的。这些改编的作品，其原作有的是古典小说或戏剧，有的是影响较大的现代作品，其他诸如回忆录、传记以至新闻报道等也都可以成为改编电影的素材，其范围是十分广泛的。

至于改编的结果，有的对原作做了忠实的“电影化”，即原封不动地搬上银幕；有的则取长补短或改头换面，甚或统摄原意，另铸新篇；有的大刀阔斧，删繁就简，使其线索单一，人物突出；有的则添枝加叶，大事繁衍。总之，凡是成功的改编无不都是各具匠心，妙用刀笔，形形色色，各有千秋。

然而，毫无瑕疵的样板式的模式是没有的，一成不变的艺

术加工方法也不存在。我们向读者提供这套丛书，并不是想向读者提供什么范例，也并不认为这些都是无懈可击的成功之作。我们没有对这些作品的改编技巧进行什么分析评论，这一方面是囿于水平，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给读者造成先入之见，影响读者独立研究的兴趣。

最后，必须声明的是，这套丛书中有些是文化大革命前旧书的重版，如《罗马11时》，有的则是新编的。特别是新编的选题，按例应当除了作品本身以外，尽量编入一些有关资料，如原作者或改编者关于创作意图或经验的文章，有关的评论以至改编影片的剧照等等，这样就可以给读者提供更多有助于分析研究的材料。但是由于我们手头几乎没有任何可供编选的资料，这十年来“四人帮”肆虐的结果，使我们原有的资料散失殆尽，而近十年来的外文书刊则全付阙如。可以说，我们这套丛书的头几本在内容上显得比较贫乏，也反映了“四人帮”对电影研究工作破坏之严重。好在这套丛书今后还将继续不断地出下去，我们相信，随着各项工作的逐步恢复和开展，这种缺陷一定会逐步得到改进和弥补。希望读者热情予以批评和帮助，使我们出好这套丛书。

一九七九年春

目 次

原画再现——人物描摹集（小说片断）……………（1）

〔美〕莉莲·海尔曼

陈叙一 译

朱莉亚（镜头纪录本）……………（41）

〔美〕阿尔文·萨金特改编

陈叙一 译

原 画 再 现

——人物描摹集

(小说片断)

【美】 莉莲·海尔曼 著

陈 叙 一 译

油画上的颜色，由于年代久了，有时候就斑驳了。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有一些画会露出最初勾勒的线条：透过一件女人的衣服露出一棵树；一个孩子让位给一只狗；一条大船不再漂浮在海面上。这叫做“原画再现”，因为画家“悔悟了”，改变了初衷。大概这也可以说，最初的看法被后来的抉择所取代，是一种观察和再观察的方式。

这是我在这本书里描摹这些人物的全部用意。现在颜色已经老化了；我想看一看过去我有过些什么机遇，现在我又有些什么可回忆的。

我给这里面许多人改名换姓了。其实现在这已无关紧要，不过，我相信火车上那个身材壮实的女人，至今还住在科隆，而且我不敢保证德国人，即使在现在，会喜欢这些初出茅庐的反法西斯分子。更主要的是，朱莉亚的母亲还活在人间，说不定朱莉亚的女儿也还活着。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现在这女儿的父亲住在旧金山。

1937年，在我写完《儿童节目》和《未来的日子》之后，我被邀请去参加莫斯科的戏剧节。过去在我的文章里，每次提到这次旅行，我总是避而不谈途经柏林的这一段经历，因为我不忍心写朱莉亚的事。

陶蒂·派克和她的丈夫艾伦·坎贝尔，在同年八月准备去欧洲，于是我们搭乘当时的“诺曼底号”一起出发了；尽管坎贝尔以及他那故作温文尔雅的戏谑老是弄得我坐立不安，一路上还算愉快。

到了巴黎，去不去莫斯科我还没有拿定主意。我住下来，高兴地结识了初次见面的杰拉尔德和萨拉·墨菲，见到了从西班牙回到法国的海明威，还有林·拉德纳的儿子詹姆士·拉德纳，此后不久，他参加了国际纵队，几个月以后死在西班牙。

我喜欢墨菲夫妇。我一直喜欢他们、对他们感兴趣，但是他们给予我的印象，不同于他们在老一代人心目中的印象。也许他们正像卡尔文·汤姆金斯在他的自传里所说的那样：很有风度。杰拉尔德机智风趣，萨拉落落大方、精明能干，那年夏天，在他们两个儿子不幸去世以后不久，他们叫人觉得更加可

敬可亲了。但在此后和他们的多年交往中，我终于相信他们并不像别人想的那样快活，彼此之间也并不是毫无芥蒂的。早在我跟他们交往结束之前，我意思说在杰拉尔德去世前几年，当他们不大跟老朋友来往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他们的生活过多地建立在风度上了。对那些由于风度得到好处的人，风度确实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但是对那些为风度规定一些必不可少的严格标准，而且按此生活的人，恐怕往往是得不偿失的。

那年夏天，还有另外许多有钱的名人来到巴黎，他们邀请陶蒂去参加晚宴、乡村午餐，还请不会打网球的她去打网球，不会游泳的她去游泳。看到人们巴结她，不论在当时或者以后，总是给我带来很大乐趣。我觉得有趣的是，她那种假惺惺的、过分周到的应酬功夫，往往掩盖着对那些逢迎她的人的蔑视和厌恶，而恰恰在这同时，她又少不了要别人逢迎她。在她酒喝足了以后，那应酬功夫更是好得叫人作呕，不过，这时候她会说出锋芒毕露的俏皮话，以便向她自己表明，似乎也向我表明，没人能够收买她。她错了，他们能够收买她，也确实收买了她好多年。但是，他们只支配了她一生中有限的一段时间，她去世前还是走上了自己的道路。

这儿叫我大开眼界了。我也曾经像现在每一个在剧坛崛起、年纪不大、还没有被人看厌的新红人一样，在纽约和好莱坞受到过别人的巴结。可是邀请我的人，要跟那个月在巴黎巴结陶蒂的那些人比起来，都是一些二路货色了。我过得很愉快，是我一生中过得最愉快的日子。可是有一次通宵狂饮之后，我再也不喜欢这种日子了。我是经济萧条时期的人物，大概是一个清教徒式的社会主义者（尽管这个名称超出了我当时的思想实际，却可以把自己勾勒得更加轮廓分明），我充满了罗斯福时代早期给许多人带来的那种激情。陶蒂对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思考的东西，像社会和前途，也有同样的激情，但是我们之间的差别，要比两代人之间的差别更厉害；凡是我厌恶的

东西，她都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确实她也常常对那些吸引着她的有钱的名人反戈一击，而我压根儿不喜欢他们，所以就用不着去费这个心了。

那个月我跟小时候最亲密的朋友，当时在维也纳读医科的朱莉亚，通过好几次电话。就在那次狂饮的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朱莉亚，告诉她过一天我要去莫斯科，顺路到维也纳来。可在当天晚上，深夜了，她打电话来了。

她说，“我要你办一件重要的事。也许你办得了，也许你办不了。千万请你在巴黎再住几天，有一个朋友会来找你。如果一切顺利，像我希望的那样，你就得决定坐经过柏林的直达车去莫斯科，在你回来途中，我会跟你见面的。”

我说了我不明白，这朋友是谁，为什么要经过柏林。她说，“我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你明天去弄个德国签证。你可以自己拿主意，只是现在不要多问了。”

只要是朱莉亚叫我去做的，我还从来没有想到过不做，因为我们之间过去一直就是这样的。所以第二天早上，我顺便到德国领事馆去办签证了。那领事说，他们可以给我旅行许可，但是不同意我在柏林过夜；俄国领事说这种做法，对去莫斯科的人是常有的事。

我等了两天，准备给朱莉亚再打电话的那天早上，我下楼到墨里斯旅馆的餐厅去吃早饭（最近我一直躲着陶蒂和艾伦，谢绝邀请，而且我心里对艾伦写来的两张出言简慢、带有猜疑口吻的便条，问起我在做什么，为什么闭门不出，感到很不痛快）。服务台的侍者说，坐在长椅上的那位先生正在等我。一个高个子的中年人从长椅上站起来说，“海尔曼女士？我是给你送车票，跟你谈谈你的计划来的。朱莉亚小姐叫我带着这份旅行指南来找你。”

我们走进餐厅，我问他想吃些什么，他用德语说：“你看我吃一点鸡蛋、面包、热牛奶，可以吗？我没有钱，付不出。”

等侍者走开以后，这高个子说，“你以后一定装作不懂德国话。我做了一件错事。”

我说没有人会把我懂得这么一点德国话当作一回事，可是他没有回答我，食物送来之前，只顾低着头看那份旅行指南。他吃得很快，一边吃一边微笑着，好像记起了很久以前什么有趣的事儿一样。吃完以后，他交给我一张便条。便条上写道：

“这是我的朋友约翰。他会告诉你的。不过听我说，不要勉强自己。如果做不到就做不到，没有什么不光彩。不管怎么样，我不久会跟你见面的。爱你的朱莉亚。”

约翰先生说：“谢谢你请我吃了这顿早饭。现在我们去图勒丽丝公园散步，好吗？”

我们走进公园的时候，他问我对本杰明·富兰克林有没有研究，是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说这方面我几乎一无所知。他说，他十分敬佩富兰克林，也许有一天我能在美国替他弄到一张精美的富兰克林的相片。他忽然在一条长椅上坐下，尽管这一天又冷又潮，他却用手巾擦着额头上的汗。

“你弄到德国签证了吗？”

“弄到了旅行签证。我不能在那儿过夜，只能在柏林换车去莫斯科。”

“你肯替我们携带五万块钱吗？我们认为，虽然不能绝对保证，可是你不会遇到麻烦的。你要把这笔钱带到，我们就能用它行贿，营救出已经关在牢里和即将关进去的许多人。我们是一个小团体，是一些可贵的从事反对希特勒的人员。我们不是由于共同信念、或者宗教信仰而组成的。为了取这笔钱而来车站接你的人——如果你同意的话——原先都是一些小出版商。我们里头有天主教徒、共产党员、各种各样的信仰的人。朱莉亚说过，要我一定替她提醒你，你怕人家说你胆小，所以有时候会去做你做不到的事，这样对你、对我们可能都有危险。”

我的手无意识地在钱包里不停地拨弄，点燃了一支香烟，

接着又拨弄了一会儿。他松了一口气，好像很累的样子，舒展了一下身子。

过了一会儿，我说：“我们去喝一杯酒吧。”

他说：“我再说一遍。我们认为一切都会顺利的，但是，也很可能出岔子。朱莉亚叫我一定要把这话跟你说清楚，即使万一到华沙的时候，我们跟你失去了联系，朱莉亚会托她的舅舅约翰，利用她的家庭关系，叫那里的美国大使出面。”

“我知道她的家庭关系。有一段时间，她不太信任他们。”

“她说你会注意到这点的。而且要我顺便告诉你，她的舅舅约翰现在当上州长了。他不喜欢她，可是为了自己的前程，又少不了向她要钱。还有她母亲新近又离婚了，这使得她母亲也要靠朱莉亚生活了。”

我一想到朱莉亚在支配着她那百万家产的家里人的这幅情景，就觉得好笑。在我们十八岁以后，我们大概最多见过十一、二次面，所以这些年显然起了许多我不知道的变化。朱莉亚是在大学里退了学去牛津的，接着又去维也纳读医科，成了弗洛伊德的学生兼病人。最近十年里，我们只有一次在一起过了一个圣诞节，还有一个夏天，我们坐她的小船在马萨诸塞州沿海航行了一个月，虽然这些年我们写了许多信，可是除了知道一点彼此生活里的简单情况以外，根本不知道最能反映真实的日常情况。

比方说，我知道她后来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或许她过去早就是了，而且是按这个标准生活的，她住在维也纳的贫民区，在一家公寓里租了一间屋子，用她的万贯家财周济那些急需的人。奇怪的是她送给我的礼物倒没有少花钱，又多又贵重。这些年她只要一看到我可能喜欢的东西，就把它买下来送给我：古老精致的英国瓷器；一幅图卢兹—洛特雷克的画；一件我们一起在巴黎看到的镶皮边的大衣；一套巴尔扎克全集，她把它配套放在珍贵的法兰西第一帝国时代的写字台里；还有

一副美极了的英国乔治王朝的首饰，这是我绝想不到她会抽出时间去买的东西。

我对这个身分不明的人说：“我可以考虑几个小时吗？朱莉亚的意思是要我考虑一下。”

他说：“不要想得太多。做这种事最好不要考虑得过头了。我明天早晨会到车站去的。如果你同意携带这笔钱，你跟我说一声‘哈罗’。如果你认为这对你不合适，你不要理我。不管你是怎么决定的，不要为此焦虑。”他伸出手，鞠了一躬，从我身边走开，穿过公园走了。

我整天在圣一夏贝勒大教堂附近逛来逛去，要了中饭、晚饭又吃不下，直到我拿准了陶蒂和艾伦大概已经跟墨菲夫妇一块儿出去吃晚饭了，我才回旅馆去收拾行李。我给他们留了一个条子，说我明天一早动身，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再来找他们。这一天我就是这么过的，心里乱成一团，拿不定主意。于是我躺下，下定决心不到自己理出个头绪来不睡觉。可是要作出决定，特别是要作出重要决定，总是使我昏昏欲睡，也许这是因为我知道，反正早晚我会靠本能作出决定，而且只有别人告诉了我应该怎么做，我才会把事情想得头头是道。总之，我一觉睡到天亮，醒过来正好赶上清晨的那班火车。

我看到陶蒂和艾伦在接待厅里等我，他们要送我去车站，我心里很不高兴。我再三地表示不同意，态度是那么坚决、那么生硬。艾伦这个对假话嗅觉特别灵敏的人就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原因不要他们陪着我去。艾伦去找出租汽车的时候，我对陶蒂说：“对不起，如果我的话说得不太客气请原谅。可是艾伦直叫我发毛。”

她笑了一笑，“亲爱的莉莉，他要不叫你发毛，那你就成了神经病了。”

到了车站，等人把我的箱子拿进站以后，我就催着他们走，可是不知道因为什么，也许是我的神经紧张，引起了艾伦

的兴趣，反正决不是像他一口咬定什么从来没有听说有人从柏林换车去莫斯科这样的事，会引起他的兴趣的。他尽说一些很不得体的笑话，像什么话一定不能对俄国演员说，怎么把鱼子酱偷偷运出俄国，还有像艾伦这样的人，当他们心里明明想说别的，却旁顾而言他的那种连篇废话。

我看见那个身分不明的人从月台那边走过来。当他走近我们的时候，艾伦说：“昨天我看见跟你一起在图勒丽丝公园的，不就是这个人吗？”在我转过身去准备对艾伦说些什么的时候（要是开了口，天知道会说些什么），那个身分不明的人从我面前走过，向车站大厅去了。

我向他跑了过去。“约翰先生！劳驾，约翰先生！”在他转身的时候，我着了慌，大声叫道，“请你不要走。请不要走！”

他站着一动也不动，皱紧双眉，好像过了一段很长时间。然后他朝着我慢慢地往回走，好像小心翼翼、踌躇不安地走过来了。

这时候我记起来了。我说：“我只是想跟你说一声‘哈罗’。你好，约翰先生，哈罗。”

“你好，海尔曼女士。”

艾伦过来站在我们身边了。得赶快速个话儿过去。“这是坎贝尔先生、派克小姐。坎贝尔先生说，他昨天看见我们，他这就要问我，你是谁；他还会说，没想到我们彼此那么熟悉，你居然会专程来为我送行。”

约翰先生毫不迟疑地说：“要是真这样倒好了。不过，我是来找我姪子的，他在这儿换车去波兰。他不在他那节车厢里，迟到了，这是他的老习惯。他的名字叫W·弗兰茨，四号车厢，二等车。如果我找不着他，你要跟他说一声我来过，那我不胜感激了。”他举了举帽子。“我太高兴了，海尔曼女士，我们有这个说一声‘哈罗’的幸会。”